

纪事

1980年3月成立的凤凰联合企业运作十分成功，酿酒、农副产品加工等生产经营红红火火，当年12月老百姓便开始分红。第二年比头年多，分配大会上，社员们认真听取联合企业介绍分配情况。（杨朝阳 提供）



火井伐木那些事

高义奎

邛崃西部是大山地区，尤其是南宝、高何的九顶山、玉灵山、镇西山等，崇山峻岭，悬崖峭壁，峰峦起伏，沟壑纵横，森林茂密，野兽出没，人迹罕至。过去交通不便，货物运输困难。特别是山里大量的木材要砍伐和外运，更是十分艰难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为了砍伐和运销山区木材（主要是杉木），支援国家建设，邛崃县木材公司在火井专门设立了木材站，收购、转运木材。平时，火井木材站在当地组织许多农民上山砍伐树木，并派有专人随伐木工人常住山上负责伐木，还派有专职医生随行保健。如高家口的农民冯万阳等，就常带一批人上山伐木。除了用大刀（斧子）砍伐树子，还要包运送到山脚下，既艰苦，也很危险。内行砍树时，首先要看好树子丫枝长势，准确预估树子倒地的方向，朝倒向之处“开刀”。当树子前头砍伐过半，在恰当之时，再迅速从后头稍高处“杀斧”，才能保证所砍树子顺利倒地。否则，就会“翻桩”、“烧香”。所谓“翻桩”、“烧香”，就是树子未按预定方向倒地，而是乱倒。如果挂在其它树上就很麻烦了，要淘八背篋气才能把它弄下地，既累人，又费时。树子砍倒了，要脱去树皮，还要“齐头”——将树头用大刀砍削成和尚头（圆头），便于放入洪槽运输。

砍的树木脱掉木皮、截去树巅后，称为元木，要从山上的洪槽里

放到山下。这“洪槽”是依山势建成，专门顺槽滑溜放送元木的土槽子。放送元木时，一定要沿槽边派人看守，处理意外事故，随时准备用“啄子”（一头镶有像鸟嘴状铁钩的斑竹长竿）啄拖木头，使之顺槽而下。看守洪槽是十分危险的工作，如一次在小胡椒山上放木头下山，有夜合村的王明清在看守洪槽。上面的元木一时间卡住了，他正站在下方洪槽看守。不料，上面的木头却突如脱缰野马般飚飞下来，猝不及防，顿时把他撬起一丈多高，摔成重伤。工地医生迅速进行抢救包扎，工友们乱作一团，大家七手八脚绑个简易担架，火速送转火井，中途死亡。工友们连夜将死者抬到木材站，强烈要求妥善解决。后来，木材站也只给了300元安葬费了结。又如，陈家坝的吴瑞良也是在天台山大榧口伐木被砸死的。再如，观音阁周定奎，在小胡椒伐木摔成重伤，只是在家养伤期间，照出勤计算，发给工钱，却无医药费补助等。当时的伐木工人是没有任何保障的，所以，人们常说：“跑青山下苦，就像血盆头抓饭吃。”

那时山区没有公路，运输木材（元木），全靠人工“旱盘”和水运。

所谓“旱盘”就是人力搬运。人们为了省力，便因地制宜，采用“拉木头”的土方法，专门运输山区木材。其方法是：两个人一组，一根五六尺长抬杠，一条七八尺长的粗麻绳，外加一盘铁圈。此铁圈形状奇特，是请铁匠特制的一个大铁钉，约有六七寸长，比手指略粗，下头如燕尾形、尖状，上头特制一个大孔。孔中套一个如碗口大小，能灵活转动，有中指粗细的铁圈。当时人们叫这带钉的铁圈为一盘“圈”。拉木头时，将元木置于地上，把铁圈钉在元木的一定部位，在“圈”中穿上麻绳，二人站在两侧，把抬杠放在肩上，再将麻绳搭在抬杠上，并根据身高和地形的实际需要，把麻绳收放到适当长度，二人便可各用一手紧握麻绳，全身用力向前拖动元木前进。根据元木的大小长度来决定拉木头需要用“圈”（人数）的多少。有的要前一后用两盘圈，有的要用三盘圈，有多的要用六七盘圈的，最多时可

达十多盘圈。大家使劲拉木头时，为了同时用力，便由前面一人领喊“号子”，众人同声呼应，声音非常整齐、铿锵而沉重，很具有鼓动性。他们喊的劳动号子有两类，一类是在下坡或平路很顺利时，大家都比较小声、快速而轻松地喊：“吉了、吉了……”当上坡或遇困难时，便一人大声领呼：“吆——嗨在嘞！”众人则齐声短促疾呼：“吆，在！”并同时用劲将所拉元木向前挪动一步。如此循环，不断前进。每天都能听到沉重而有节奏的号子声，在群山中疾起，回荡峰壑，响彻云天，昭示着五十年代邛崃深山的神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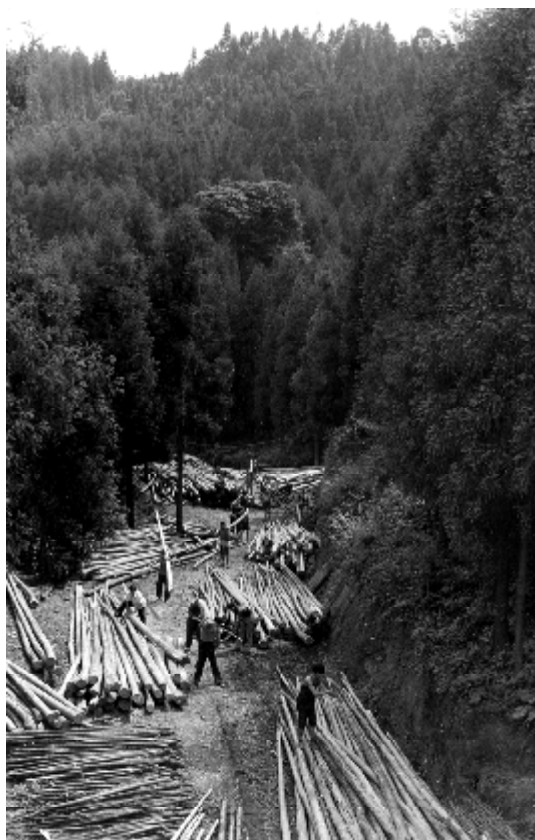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，山间小路上，随时可见这些拉木头的年轻人。他们三五成群，结伴而行。脚穿粗耳草鞋，身着破旧衣服，捞脚挽手，肩头顶着一张黑乎乎的“垫肩子”，腰间拴一根棉带子或草绳，还有许多人打着光脚板，虽能挣钱，却是十分艰苦。在悬岩陡坎、危险难行之处，还须用元木搭架通过。如火井山家营的“擦耳岩”（但听地名即知其险），是九顶山元木运出的必经之路和捷径之一，在五十年代就曾搭过两三丈高的“天桥”，以便拉木头通过。那时，火井双童村的詹良安、杨栋良、杨志钊、王德圣等，都是拉木头的好手。

火井木材站，位于今之火井小学河对岸。堆放元木的场地就是河边宽约5亩的“骆家营”大草坪（今已不存）。无数辛劳的人群从各条山间小路拉来的大小元木，在这里堆积如山。再从水路（文井江）运到邛崃以外的新津、成都等地销售。那时的文井江水源充足，水量丰富，足可行船。到了冬季水量减少，人们就在河道中掏出壕沟，便于水运木材。当时，凡是河道中的堰埂，都按规矩专门筑有“壕沟”，方便船、筏通行。当年，火井李家营、陈家坝一带，有许多出门下苦放耙子（木排）的年轻人，如李怀福、陈敬明、陈福贤、陈存新、任绍林、杨德成等等。从火井到新津等地，放一趟耙子，约需二十天，甚至一个月。耙子上有住人的简易窝棚，也有简单的锅、灶，撑耙人吃、住都在耙子上。

所谓耙子，是绑扎成排的元木，也就是木排，书上叫木筏、筏

子。通常每节耙子要扎 7、8 根元木（材积约一立方米），长约两三丈不等。全部树巅朝前（水流方向），每排木头用小木棍和竹篾扎紧，成前窄后宽状，便于在水中行走。每个木排称为一节耙子，三至五节木排称为一张耙子。最长的一张耙子有十节。每人撑一张耙子，约有三至十方材积。如果漂行在陡水河中，走得较快而且省力。若到平水河滩，如马湖“七里半”（地名，即今之“九里泮”）长滩，撑耙子就很费劲，行走极慢。1957 年，笔者在步行进城读书途中的河边，就看见“七里半”河滩中像长蛇一样的耙子，在水中如蜗牛般爬行。撑耙子的人站在耙子上，一篙竿一篙竿地使劲蹬着两腿，艰难地撑着沉重的耙子缓缓前行。放耙子很苦，双脚长期泡在水里，脚丫子泡烂了，红肿、溃瘍，就在河边捋些水麻柳叶，揉烂，敷在伤口上，很痛。后来，有放耙子的年轻人陈敬明，在南河坎遇到一个打渔子老头儿。那老头儿见他的脚丫子泡烂了，没有皮，红扯扯的，就对他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要用白矾敷泡烂的脚，才好得快啊！”后来，他用白矾一敷，顿感凉悠悠的，真的效果不错。放耙子要避开洪水天，一般都在秋、冬之季。一人每天可挣工钱 3、4 元钱。

到了六十年代，经过



火井木材站在当地组织许多农民上山砍伐树木，并派专人随伐木工人常住山上负责伐木。

“低标准”三年困难时期，火井周围大山上的树木都被砍光了，无木可伐。于是，邛崃木材公司便将砍伐木材的地点转移到九顶山背面的大胡椒、秋园子、甘山子一带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。所伐原木都是利用玉溪县丰富的水源，大量放“漂木”——即脱了皮的杉木（元木），通过山上的“洪槽”放下山来，放入玉溪县水道中，漂送到芦山县城外的储木场，再扎成耙子，用人工水运到雅安搬上岸，再改用汽车运到成都等地销售。这种单根散放元木、随水漂流的水运方法叫“单漂流送”，并要在沿河设站，分段派人看管。若发现河中有木头堵塞，便要及时用带有铁头“啄子”的斑竹长竿“啄”住，拖开，使之流畅。从大胡椒下水，经半河头、公义场等地出玉溪县，一直流送到七八十里远的芦山县城外储木场。

由邛崃木材公司组织的水运队有120多人，分成三个组，各个组负责一段河道，首尾相衔，分段看管单漂流送的元木，保证木材安全、足数送达。玉溪县水流湍急，巨石颇多，有时漂木意外遇阻扎堆，必须迅速及时用“啄子”拖开，分散漂送。如火井的小欢和林林两弟兄，都是单漂流送的高手，啄木拖木，技超众人，当时在水运队中就很出名。特别是玉溪县沿线河道弯多水急，多处隐患，险象环生，有时惊心动魄。如沿途较险之处有大转角、小转角、跳龙、斜石板等，只闻其名，便知其险。尤其跳龙最险，那里地势陡峭，上面的几节瀑布有一丈多高，下面是大深滩，漂木从上面飏下深滩。有时栽进滩中插入河底卡住了，就必须由几个人统一行动，用“啄子”一齐用力，迅速把木头硬拖起来。否则，后面的漂木一齐冲下滩来，就很麻烦了。在跳龙险滩，曾经有个大邑县来此放漂木的工人，就不幸丧生在险滩中。

为了确保安全，避免险情发生，要提前在有隐患之处采取以下防范措施：

一、架档：在河道急弯处，必须在河边架上木桩，竖排绑扎几根元木，以防漂木插进河岸，卡在河边。



县林业局的技术人员会同火井林场的林业员，经常测量、观察新栽树木的生长情况。

二、提杆挂档：在河边有大石处，竖排拦上几根元木，防止漂木撞击，或卡在石缝里。

三、滑板元木，后头埋入水面下，前头盖过石头——就像河中土法捕鱼的“渔箭盆”，让漂木从其上迅速滑过去（水湿的元木是极其滑溜的），再顺利向下漂流。

总之，“河道拦好，漂木平安”。

当时放漂木，每人平均一天能挣2元多钱，最危险的地方，有时单日能挣4元多钱。那时物价不高，大米每斤2角多钱，猪肉才6角8一斤。

现在已是改革开放时期，交通便捷，四通八达，水泥公路宽阔平坦村村通。伐木已是机械化，采用伐木机、油锯等，运木用大汽车，方便极了。那种人工砍树，人力运输，“血盆头抓饭吃”的时代已是远去的历史，只能在回忆中再现了。

（本文主要资料来源于当事人陈敬明、李怀福等老者口述。）

（本文图片由张邦贵提供）